

家庭资源重构 与农村老年人压力应对问题初探

袁同成¹ 彭华民²

(1. 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马鞍山 243032; 2.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 面对社会转型, 农村家庭需积极进行经济资源、情感资源、照顾资源重构, 以帮助老年人调整压力应对的方式, 缓解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和疾病照护压力, 维持精神健康。然而家庭资源的重构也并非一劳永逸, 子女远距离的务工经商常常造成老年人照护资源的流失, 难以应对疾病照护压力, 精神健康受损。因此国家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家庭城市化、增加社区老年护理服务供给等措施, 增加农村老年人应对压力的可得资源, 切实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 农村家庭福利; 资源重构; 老年精神健康; 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5) 09-0071-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908

一、引言

国内外关于家庭福利供给对老年精神健康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婚姻状况。多认为配偶可为老年伴侣提供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 有益于维持其精神健康;^{[1][2][4]}反之, 丧偶则可能导致老年人情绪低落, 增加抑郁发生率。^[2]二是居住安排。普遍发现独居不利于老人的精神健康;^[3]然而与子女共同居住亦是一把双刃剑: 共居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对老年人有利, 不良的亲子关系反而可能使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受损。^[4]三是家庭社会支持。一方面, 不少实证研究揭示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对老人的精神健康十分重要;^[5]另一方面, 有研究指出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也可能导致依赖, 削弱老年人的效能感。^[6]总之, 学术界已从静态方面, 就家庭福利供给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初步考察, 但从动态方面分析家庭福利供给转型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来, 急剧的社会转型已对中国农村家庭老年福利供给的

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造成了重大冲击。农村家庭如何重构福利资源以应对这些挑战, 这一资源重构过程对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又如何, 直接关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老龄化, 值得深入探究。本研究使用“压力—应对”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性为主的混合研究法, 以实现两种研究方法的“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 克服以往单纯定量研究的不足。^[7]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①访谈法: 选取皖南、皖北、皖中地区6县区11个农村社区的34位老年人, 进行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 获取定性资料, 并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资料分析。②调查研究法: 主要使用CHARLS(2011)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的, 其中2011年的基线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级单位、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

[收稿日期] 2015-03-24

[作者简介] 袁同成(1972-), 男, 安徽寿县人,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 彭华民(1957-), 女, 山西临汾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33)

10257 户家庭中的 17708 人。

三、家庭资源重构下的农村老年人压力应对形势分析

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要面临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与疾病照护压力。^[8]面对社会转型，农村家庭也积极进行经济资源、情感资源、照顾资源重构，以帮助老年人调整压力应对的方式，纾解这些压力。但是针对不同压力的资源重构特征与应对效果却不尽一致。

1. 家庭经济资源重组与农村老年人经济压力应对

由于目前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普遍较低，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不足问题依然是农村老年人必须首先面对的重要压力。^[9]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应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经济支持资源重组，以帮助农村老年人有效应对经济压力，维持基本的经济安全感。

(1) 变革供养形式。过去，农村老年人主要通过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或者轮流供养等方式获得经济供养。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农村空巢家庭骤增，通过父代与子代长期或者短期共居以提供经济供养的方式已难以持续，所以不论子女在附近工作还是到外地务工经商，大多数家庭都选择了定期给钱给物的供养形式。采用这种供养形式，只要子女能够集体尽孝，确保老人经济供养充足，就能起到缓解经济压力、维持老人精神健康的效果。比如皖南 T 县 72 岁的老人 SCH 患有哮喘病，妻子也患有坐骨神经痛、风湿、肾结石等疾病，生活完全依靠三个孩子。他们的儿子在县城做公务员，大女婿是包工头，小女儿家境也颇为殷实，而且几个子女也都能按时给钱给物。老人说，“其实我也不找儿女们要，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知道用完了就给，一给就是上千元，反正生活呢，我们也是苦过来的，也不会浪费他们的，过得去就行了”。由于子女全部都能尽孝，老人表示“一点烦恼都没有，晚上睡得很香”。但是我们也发现，只有子女集体性地尽孝才能真正提高老人的幸福感，促进其精神健康。如若仅仅是个别子女孝敬，而其他子女不孝，同样也会使老年人产生失落感，这是因为中

国人的养老是反哺式的。^[10] ^[P6-21]老年人对于这种反哺已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在任何子女身上落空，都会使老年人产生失落感。反之，在子女外出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定期与不定期经济供养得不到保障，就会严重降低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对于遭遇重大疾病的贫困老人尤为如此。

(2) 增加供养主体。社会转型期，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之外，女儿和孙辈也已成为老年人经济福利的重要供给者。一则随着女性更多地进入非农劳动力市场，妻子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提高，由此使得作为父亲家庭的非正式成员，本来不承担赡养责任的女儿，^[11]也开始在父母经济福利提供中发挥与儿子并驾齐驱的作用，有些甚至超过了儿子。比如皖北 D 县 70 岁的 ZJZ 老太太说，“三个女儿哪回来都不空手啊，去年我生病了，二女儿给了一千多块钱，大丫头也给好几百，三丫头尽管从小抱给人家了，我没养活她，但回来也不空手，我心里高兴啊”。二则孙辈在外出务工后，回馈祖父母的能力增强，也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供养主体。比如皖南 T 县 76 岁的老太太 YAR 就对春节期间孙辈们的孝敬算了一笔账：大外孙 C 回来给了 100 元，大孙女 XM 给了 400 元，外孙 HC 回来给了 100 元，外孙女 DM 给了 100 元，外孙 HF 给了 200 元，外孙 TF 买了一双几百块的鞋，积累起来颇为可观。通过定量资料分析，也可看出，随着年事增高，农村老年人获得孙辈的经济支持也同步上升 (60-70 岁老年人平均为 537.88 元，70-80 岁老年人平均为 568.31 元，80 岁以上平均为 849.35 元)。这可能是因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越是年长的老年人拥有越多的孙子女数，来自孙辈的经济支持总量也就越大。

(3) 细化供养分工。家庭成员经济供养还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分工，特点是儿子保基本生活，比如粮食的提供，而女儿则会在衣服、现金、营养品等方面提供超越温饱线的供给。如前述皖南 T 县 76 岁的老太太 YAR，老伴过世，一个儿子提供日常饮食，四个女儿则经常带营养品等东西回来看望，去年还合伙为其打了一对金耳环。老人对女儿的养老也认为理所当然，“我把她们养这么大她们给我点钱花也是应该的，有了几个女儿的孝顺，我感到更幸福，这生活还有什

么要抱怨的呢”。此外，女儿经济供养的优点还在于女性心细，考虑周全，更能提高老年人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4) 重塑互惠关系。主要体现在留守老人帮助照顾未成年孙辈方面。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已达 6102.55 万，其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约占 32.67%，^[12] 规模庞大。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外出子女一般都会为留守祖孙留下较为充裕的钱物。而祖孙的生活费用实则无法截然分开，由此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供给。比如皖北 D 县的 QSY 老人，老伴过世多年，4 个儿子都出门打工，自己独自一人在家帮小儿子带孩子上学；除了其他儿子定期给钱给物外，小儿子半年间就给老人留了 2500 元和 15 袋稻，仅此就基本够祖孙二人开支了。代际交换促进了农村家庭福利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水平。^[5]

2. 家庭情感支持模式调整与农村老年人精神压力应对

有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必然降低农村老年人与子女情感交流的频度和深度，使得留守老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8]但是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外出务工并非一定导致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的弱化，家庭成员依然可以通过调整精神支持分工，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等方式，继续向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助其纾解精神压力。

(1) 情感支持提供主体的变化：从家庭整体转向以女儿和老伴为主。与以往共同居住或者比邻而居情景下全体家庭成员都可向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不同，随着快速的人口流动，老年人情感支持的主体开始偏向配偶和女儿，儿子与女儿提供情感支持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扩大。^[13]女儿较之儿子探视和电话联系的次数一般会更多，老年人，尤其是女性老年人也更愿意把生活的烦恼向女儿和老伴倾诉。如皖中 W 县 71 岁的 WLY 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外打工。她说：“有苦恼怎么处理呢，通常只能和老伴或者大女儿聊聊，有些家里事又不能和门旁二面（邻居）说，人家不笑话你吗？”

(2) 情感支持提供方式的变迁：从面对面的问候到以电话交流为主。由于子女在外打工不能经常回来，除了返乡面对面的探视，通过电话与老人进行情感交流，开始成为家庭情感支持的

主要方式。为了联系方便，不少家庭都为老人购买了“老人手机”。如皖北 D 县 70 岁的丧偶老太太 ZJZ 说，“二儿子虽然不怎么回来，但是经常打电话，半月就打一次，大丫头一年至少回来一次，二丫头一年也回来几趟，但是孩子们电话都经常打，叙叙，互报平安，也放心”。可见，如果儿女外出后，能够定期或不定期保证经济供养，并不忘电话问候老人，也可一定程度抵消老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

(3) 情感支持提供效果对比：子女外出并不一定造成精神健康水平降低。通过子女在家与子女外出两种状态下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的对比，我们发现，外出与否并不必然导致老人精神健康水平的提升或者降低，亲子关系的好坏或许更为重要。如皖南 T 县 82 岁的 SGH 老两口，平常单独租房居住，两个儿子都没有出门打工，但是大儿子一年都不来看望他们一次，二儿子也只是偶尔来一下，媳妇更没有来过。他说，“现在没有和他们吵过架，要是想吵，那就会经常吵，想想自己没人问就伤心，睡不着觉”。可见，子女在家并不必然带来探视的增加，反而可能因为互动关系不良而降低老人的精神健康。在定量数据分析中，我们考察儿女联系老人最短时间间隔与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联系频次不同，老人精神健康水平均值确有差异，但并非与子女联系频次越多，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也就越高（差不多每天联系一次 = 31.30；每周 2-3 次 = 30.62；每周一次 = 30.91；每半个月一次 = 29.25；每月一次 = 29.51；每三个月一次 = 28.52；半年一次 = 27.72；每年一次 = 28.76；几乎从来没有 = 29.46）。其中不同联系频次对应精神健康水平差异显著的也只有半月联系一次比几乎每天联系一次低 2.05、每三个月联系一次比几乎每天联系一次低 2.79、几乎从来没有联系比几乎每天联系一次低 1.84。

3. 家庭照护资源的流失与老年疾病照料压力应对困境

进入老年期以后，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农村老年人各类急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明显提高，^{[14][15]} 送医护理压力增大。但是剧烈的人口流动往往使得家庭成员难以在回乡护理与在外工作之间做出两全选择，无法实现传统家庭照护资

源的成功重构。由此往往造成照护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加之缺乏社区养老服务等替代性资源，无疑会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重大冲击。

(1) 慢性病缺乏护理严重影响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随着从“传染病时代”迈入“慢性病时代”，^[15]农村老年人带病生存周期延长。而由于慢性病发展较慢，难以治愈，规范治疗及日常照护对于老年人生存质量便十分重要。但由于外出子女在回乡照护还是在打工挣钱之间进行取舍时，往往容易忽视慢性疾病的危害程度，难以割舍在外的工作，未能重视父母慢性疾病的规范治疗，导致延误老人病情，加剧身心痛苦，使其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精神健康受损。如皖北 D 县 70 岁的老太太 ZJZ，老伴过世多年，患有高血压、双肾结石、尿结石、胆结石等多种疾病，两儿三女都出门打工。当被问及生病有谁照顾时，老人说“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啊，孩子们回来一趟也不容易，还要扣工资，也都有自己的负担，我一个人在家，不受罪才怪，患病了，就自己去找人吊水啊，就这肾结石今秋就患了五六回了，讲起来是应该去住院开刀，可是住院有谁去服侍我呢，问我心情怎么样，有病了，没法好好治，活受罪，从哪儿来高兴呢?”

(2) 急性疾病无人送医护理更易使农村老年人陷入绝境。由于回乡不仅会导致外出子女收入减少，还有可能使其承担丢掉工作岗位等机会成本，在子女不孝的情况下，即便父母罹患急性疾病，也有可能不会及时回乡送医救治。如此则会使老人陷入生活绝境。皖南 H 县 66 岁的老太太 HXZ，去年患了脑梗塞，差点瘫痪，在县城医院住院多日，不断打电话催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但没有一个愿意回来，也没人寄钱，都说很忙，干活离不开。受访时，老人既焦虑又绝望，一直泪流不止。

(3) 日常患病缺乏照料亦会增加农村老年人的无助感。老人罹患伤风、感冒等日常小病，子女一般更不会损失路费和误工费从遥远的打工地回乡照料。这些日常疾病得不到及时护理，也会增加老人的沮丧感和无助情绪，降低生活质量。皖南 Z 县 85 岁的老太太 XXY，老伴去世多年，平时孩子们打工返乡时也能给钱给物，但最让她感到无奈的还是平时生病无人照料“在家

没有生病都好，生病了，也还只有自己烧锅，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谁帮你烧锅啊？一个人慢慢烧呗，不舒服就睡觉，好些了，才起来烧点水，用开水泡点东西吃（孩子们买的营养品），谁来问啊？哪有人在家啊？累了这些年，想想也寒心。”

概言之，面对社会转型，农村家庭主要通过给钱给物、重塑互惠关系、增加供养主体、调整供养分工等方法重构经济资源，缓解老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外出务工子女只通过不定期的探望和打电话等变通方式重构情感资源，帮助老年人应对精神压力。但人口流动往往造成传统照护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并难以实现资源重构，导致农村老年人无法成功应对疾病照护压力，令其产生无助感和焦虑感，严重影响精神健康。

四、结论与建议

总之，尽管急剧的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家庭老年福利供给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提供方面，农村家庭依然积极改变策略，通过变革供养形式、增加供养主体、细化供养分工、重塑互惠关系、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等方式重构福利资源，继续向老人提供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以实现家庭关系的调适与重建，修复家庭的养老功能，纾解农村老年人遭遇到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助其维持精神健康，展现出较强的抗逆力和适应力。^[16]但是农村家庭福利资源的重构也并非完全成功。对于老年人面临的疾病护理压力来说，远距离的务工经商常常使得子女不得不在养家糊口与回乡护理之间做艰难选择，由此造成农村老年人疾病照护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加之缺乏国家和社区提供的替代性资源，往往使得老人不得不选择保守治疗甚至延误病情，遭受身心痛苦，产生焦虑、无助、抑郁等症状，精神健康受损，生活质量降低。

其实，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调整，都涉及正式和非正式福利供给之间的责任结构调整问题。^[17]具体而言，国家除了进一步帮助农村家庭重组经济支持资源和情感支持资源以外，对于家庭无法成功重构的疾病照护资源问题，则可从满足留守老人需求和推动农民工家庭市民化两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注释:

[1] Browning D, Doherty W J, Gallagher M, et al. Does divorce make people happy? Findings from a study of unhappy marriages [M].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2002.

[2] 龙理良. 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对生命质量影响 [J]. 中国公共卫生, 2007 (2).

[3] Dean A, Kolody B, Wood P, et al.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lone on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rsons [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992 (1).

[4] 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5).

[5] 左冬梅, 李树苗.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2).

[6] Fyrand L. Reciprocity: A Predictor of Mental Health and Continuity in Elderly People's Relationships——A Review [J]. Current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research, 2010 (1).

[7] 张东辉.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最新进展: 混合法研究的兴起与应用 [J].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13 (4).

[8] 石金群, 王延中. 试论老年精神保障系统的构建 [J]. 社会保障研究, 2013 (2).

[9] 薛惠元. 新农保能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10).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J]. 社会学研究, 2009 (6).

[12] 段成荣, 吕利丹, 郭静等.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 (2).

[13] 宋璐, 李树苗.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3).

[14] 赵学慧.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 唐钧. 关于健康社会政策的理论思考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 (4).

[16] McCubbin, M A, et al. Resiliency in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in response to stress and crises [C] // Family assessment: Resiliency, coping and adapt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17] Espvall M, Dellgran P. Can we count on each other? Reciprocity and conflicts in financial support in Swede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0 (1).

On the Problem of Family Resource Reconstruction and Stress Cop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YUAN Tong-cheng¹, PENG Hua-min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 anshan 243032,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households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reconstruct their economic, emotional, and caring resources to help the elderly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stresses actively,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mental health by alleviating economic, mental and disease pressure. However,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is not completely successful.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their children are working in remote cities, it may well lead to the loss of caring resources, which would make their parent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disease hard. So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improv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by facilita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y or providing more community service to increase the resources for the rural elderly.

Keywords: rural family welfare; resource reconstruction; elderly mental health; impact